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行

2001 1 / 总第五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2 No.1

中國學術 迷宮

2001 1 / 总第五辑

主编 刘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年春·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总第5辑 / 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ISBN 7-100-03251-2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 - 中国 - 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3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责任编辑 常绍民

王希勇

封面设计 李有良

版式设计 毛尧泉

ZHōNGGUÓ XuéSHù

中 国 学 术

总 第 五 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251-2 / C · 67

2001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1/4 插页 1

定 价: 26.00 元

执行编辑	李四龙(北京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丁 耘(复旦大学)	岳秀坤(清华大学)
	庞冠群(北京大学)	
通讯编辑	戴沙迪(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董 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张 伦(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郑文龙(哈佛大学)
	葛以嘉(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	王冠华(康乃狄克州立大学)
助理编辑	徐晓宏(北京大学)	李冠南(北京大学)
	徐百柯(北京大学)	何 翔(北京大学)
本辑特约书评作者	孙向晨(复旦大学)	洪 涛(复旦大学)

投稿地址: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中国学术》

电子邮件:dongliu@ public2. east. net. cn

订购地址: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 话:63044891 83164425

卷 首 语

新的年度要开始了，新的“春、夏、秋、冬”四辑也将周而复始。惟愿这种催人衰老的岁月流转，不是尼采恐惧的“轮回”，也不是黑格尔厌恶的“恶无限”，而是足以救度魂灵的缓缓上升。

论文一栏，先以两篇探讨新理论的文章来除旧布新。两位作者都不想脱开中国事实，所以都像北大行将召开的“多元之美”会议那样，要来处理“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跨界难题。**德里克**基于对 1960 年代后期以来欧美史学倾向的回顾，提出历史家并非后现代主义的受众，反倒参赞了这种思潮的形成，所以与其夸大此种思潮的新奇，毋宁说它是内在于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新社会史等倾向中的；这样，中国历史领域中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敌意就不尽合理了，它既源于某些新方法倡导者的夸张和滥用，也源于对所谓正确治史家法的陈陈相因。**苏源熙**从后结构主义者把中国当成智力资源或例证仓库的普遍策略中，凸显和探究了其著作的共同母题和暗含的比较逻辑；缘此，针对那种把东方说成业已是思想的“后结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对应于某一不受批评的重构系统的观点，作者提出了一种解构的方法，此种方法不必仰赖任何人文前提，却仍可能和必须是批判的。不待言，既要涉及此类聚讼的焦点，就无法掩饰思想的锋芒，但至少在《中国学术》的小空间中，批评总要为着学理探求，而非意气发泄。

接下来三篇进行知识考古。由不同动物混成的背生双翼的想象动物，曾以各种材质为载体，流行于从春秋到魏晋的艺术作品中。此种主题源自我国还是传自域外？**李零**搜集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典型材料，并参照域外的类似主题，确认它虽已被中国化却仍大有胡气，真令人惊叹跨文化传播的由来悠久。“堵”与“肆”是先秦对编钟排列形式的特有称述，但其含义与具体排列情况迄无定论。**陈双新**主要利用考古发掘材料和铭文中的相关记载，发现“肆”指编钟大小相次的一列，“堵”指挂有编钟的形如一堵墙的钟架；二者本不对应于某一具体的钟数，但在特定时期又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俗常对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理解，泥于舶来的程式，或把前者只看成艺术样式之一，或使后者游移于文学家和知识人之间。**于迎春**基于文、文学、文人这一组递进观念的早期演化，呈示了文学在固有文化中既矛盾又互渗的本义，

以及文人在传统文明中既兼综又模糊的身份。

同时寄自哈佛的另外两篇，都涉及了现代文学运动。“五四”这个标志日子创造出了“前现代”或“古典”，从此“过去”便不再意味着朝代更替，而是自有特征的单独实体，而以往各有独特历史的各文学体裁，也随之拧成了整体性的“文学”。从这种角度和力度出发，宇文所安检视了几种不同文学体裁的现代选本和文学史叙述，从而揭示了“五四”一代如何重写文学传统以建立“白话”对抗“古典”的宏大叙事；此一新的古代文学经典虽时有变化，却由于教育系统的制度化而大致沿袭至今。金庸的小说常被指为具有根本的“中国性”。田晓菲试从小说本身及其文化语境来分析此种“中国性”之印象的由来及其文化蕴含，并认为我们最终可能发现，其“根本的中国性”虽只是作者自觉的艺术创造和建构，但此种判语的重要性却超越了具体作品，而指向一种国家主义的写作与阅读。

评论一栏，王路述评了美国语言学家卡恩的考辨。在古希腊文献中，*einai* 主要有三种用法——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系词用法，它是由句子的句法形式确定的。存在用法虽不多却重要，它与系词用法不同，主要是词典或语义概念，乃由系词的表位用法发展而来，逐渐演成一种技术性的表达，最终成为专门的哲学和宗教表达。作者缘此主张，对 *einai* 的翻译至少应反映出其最主要的用法和特征，并在“是”的意义上理解它及其相关问题。孙治本评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夫妇有关“个人主义化”的论点。同样鉴于社会多元化及异质性的增强，和个人决定之必要的增加，这种社会理论在扬弃了“社会阶级(阶层)”模式之后，却提出了解构(第一现代)后的建构(第二现代)，以探求不确定性中的多元秩序。也许，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已成习惯叙事之时，这种旨在使现代历史化的尝试，可以帮助领悟另一条进路？

通讯一栏，西川以诗人独有的体验和干脆回应了张新颖。他接过了“焦虑”这个话题，却嫌“现代焦虑”的提法太过笼统，遂把新诗的外部焦虑定义为“道德焦虑”，将其内部焦虑分为“文本焦虑”和“文化焦虑”。借着这种框架，他既反对“纯诗冲动”，而主张诗歌与生活的对称，又反对通过削弱传统来与传统衔接，认为那会妨碍与之的真正对话。

每编定一辑，总觉得下回“难以为继”，今番的忧虑似乎尤甚。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此之谓耶？

刘东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北大草庐

主 编: 刘 东

FUP/23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万俊人(清华大学) | 巴斯蒂(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 |
|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 | 王邦维(北京大学) |
|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 瓦格纳(海德堡大学) |
| 田浩(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 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 |
| 刘东(北京大学) | 刘禾(伯克利加州大学) |
| 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 |
| 张伯伟(南京大学) | 李伯重(清华大学) |
|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 李零(北京大学) |
| 杜瑞乐(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 杜德桥(牛津大学) |
|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 |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沟口雄三(大东文化大学) | 陈平原(北京大学) |
| 陈来(北京大学) | 周锡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
| 孟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 | 岸本美绪(东京大学) |
| 松浦友久(早稻田大学) | 姚大力(复旦大学) |
| 胡志德(洛杉矶加州大学) | 荣新江(北京大学) |
| 贺萧(圣克鲁兹加州大学) | 倪梁康(南京大学) |
| 唐晓峰(北京大学) | 秦晖(清华大学) |
| 钱乘旦(南京大学) | 高毅(北京大学) |
|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 | 阎步克(北京大学) |
| 葛兆光(清华大学) | 滨下武志(东京大学) |
| 德里克(杜克大学) | |

© 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第二卷 第一辑

目 录

卷首语

论 文

德里克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	1
苏源熙	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	48
李 零	论中国的有翼神兽	62
陈双新	编钟“堵”“肆”问题新探	135
于迎春	中国早期历史中文学、文人的形态和观念	148
宇文所安	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	180
田晓菲	瓶中之舟	203

评 论

王 路	对希腊文动词“einai”的理解	235
孙治本	个人主义化与第二现代	262

通 讯

西 川	抹不去的焦虑——读张新颖〈中国新诗对于自身 问题的现代焦虑〉	292
来函照登(曹树基)		299

书 评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吴承明)	301
------------------------------	-----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李俊)………	30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葛以嘉) ………………	310
梅·约瑟夫:《漂流的身份:公民权的实践》(戴沙迪) ………………	313
柯丽斯婷·卡思德兰·莱涅:《父性》(张伦)……………	316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	319
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 (孙向晨) ………………	321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李模)……………	327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赵晓力)……………	330
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强世功)……………	333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 认识与批判》(洪涛)……………	337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何德章)……………	34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戚学民)……………	345
萧凤霞:《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姜振华)…	349
塔罗:《运动之动力和威力: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政治》 (王冠华) ………………	353
托马斯·班德:《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龚刚)……………	358
乔·萨托利:《比较宪政工程》(褚松燕)……………	361

Contents

Preface

Articles

Arif Dirlik,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History	1
Haun Saussy, Calculated Surprises: Where Deconstruction and China Coincide	48
Li Ling, Motifs of Winged Fantastic Animal in Early Chinese Art	62
Chen Shuangxin, A New Inquiry into the “Du” and “Si” of Chinese Chimes	135
Yu Yingchun, Forms and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ti in Ancient China	148
Stephen Owen, The End of the Past: Rewriting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180
Tian Xiaofei, “Ship in A Bottle”	203

Reviews

Wang Lu,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k Verb “EINAI”.....	235
Sun Zhiben,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Second Stage of Modernity	262

Correspondence

- Xi Chuan, Ineradicable Anxiety: Comments on Zhang Xinying's Chinese New Poetry and Its Modern Anxiety of Self 292
 Cao Shuji, A Letter 299

Book Reviews

- Li Bozh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 – 1850* (Wu Chengming) 301
 Liu Jianhui, *Shanghai the Magic Metropolitan: The "Modern" Experience of Japan Intellectuals* (Li Jun) 306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oshua Goldstein) 310
 May Joseph, *Nomadic Identities: The 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 (Alexander Des Forges) 313
 Christine Castelain-Meunier, *La paternité* (Zhang Lun) 316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Qian Chengdan) 319
 Alfred Gottschailk, *Ahad Ha-Am, Bible and Biblical Tradition* (Sun Xiangchen) 321
 Liu Wenpeng,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Li Mo) 327
 Ji Weido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Order* (Zhao Xiaoli) 330
 He Weifang Ed., *The Road to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Qiang Shigong) 333
 Huang Kewu, *The Reasons of Liberty: Yan Fu's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of the Liberalism of J. S. Mill* (Hong Tao) 337

Li Ping, <i>The Pingcheng Age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i> (He Dezhang)	341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d., <i>Documentary Materials on the 1898 Reform, 1895 – 1899</i> (Qi Xuemin)	345
Siu, Helen F., <i>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i> (Jiang Zhenhua)	349
Sidney G. Tarrow, <i>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i> (Wang Guanhua)	353
Thomas Bender, <i>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i> (Gong Gang)	358
Giovanni Sartori, <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i> (Chu Songyan)	361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

德里克(美国杜克大学)

以下的讨论针对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某些问题展开，并涉及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果我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上比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花的时间更多，那是因为对于前者先要花些功夫作些澄清，然后才能判断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一些为数不多自称从后现代角度撰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已在某些历史学家中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敌意，它们大多建立在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所应包括的内容的误解之上¹，如果不是对其夸张的话。公平地说，这种敌意部分地是由那些新方法的倡导者们造成的。他们过于看重这种方法的新颖性，进而夸大了后现代创新模式应有的内容，这些夸张化

1 我这里指的是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何伟亚(James Hevia)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研究的无端攻击，*Cherishing Men from Afar*(《怀柔远人》)，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参见周锡瑞：〈远方的珍贵资料〉，《现代中国》(Joseph W. Esher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 24. 2 [April 1998]: 135 – 161)。尽管我对何伟亚的关于“革新”的提法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提出了在历史阐释中如何使用文化问题，这一点不应被哲学式的吹毛求疵的批评所抹煞，周锡瑞用的这种方法是汉学中纠缠细枝末节的最恶劣的传统。周锡瑞对何伟亚的攻击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因为他似乎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有关，与历史无关，这表明了对历史文化氛围的漠视，这种现象在一些历史学家中很是普遍，在他们眼中，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要面对的思想挑战，而是一种对学科的威胁，必须使其消失——即使要头顶思想蒙昧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惜。关于周锡瑞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见董正华、韩毓海：〈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采访 Joseph Esherick)，《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第49页。考虑到周锡瑞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人们不得不问，在他提到共产党是一种“社会构造”时，他是否充分意识到了他所说的意思。参见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大论点〉，《现代中国》(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 1 [January 1995]: 45 – 76, p. 61)。

的内容也许刚好与他们撰写的漫画式的历史研究著作相对应，而这实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种敌意同时也源于一种对所谓的是正确历史研究方法的过于保守的忠诚，或者说是更为保守的对保卫学科界限的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对后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滥用，也要看到因后现代历史研究而引起的这种过多的敌意；这里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决不能被视为只是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些不同主张的微不足道的争执而已。从根本上说，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和认识方式与广义上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国家）都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化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令人恼怒的词眼”，汉斯·伯顿斯（Hans Bertens）写道，因为，“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那些雪片般的使用过这个术语的文章和书籍里，在这个概念的不同层次上，后现代被广泛运用于我们曾称之为现实中的各种事件和现象。”² 伯顿斯指出，不仅是这个术语被赋予的意义在不同的领域内互不相同，而且这些意义的指向还常常互相矛盾，尤其是在关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上矛盾更是突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产生出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的范围因融合了带有后现代概念的思想发展运动而被扩大了，这个思想运动出现于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之前且与之干系不大，但是诸多后现代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们都把后者归之为后现代主义，这样更使得区分后现代和现代变得难上加难。

后现代表现出的纷乱和矛盾的外表本身拒绝了对它的简单的定义，相反，最好的办法是从关于后现代话语的具体的历史性中去把握它。关于后现代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是怎么显现的在本文中会有详尽的讨论。在这里仅指出一点已足以说明问题，即，尽管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表现出互相对抗的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研究的发展还是成为了推动后现代产生的

² 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一种历史》（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3）。

原因，并且还扩大了后者的疆域。另一方面，虽然从外表上看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与历史的敌对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却使得对于过去的思考变得合法化，从而把历史从现代性的目的论中解救出来，另外，它还丰富了我们对于过去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矛盾的关系是与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纠葛在一起的，那是一种希望与失落并存的文化遗产，它产生出了新的历史起点，并对在现代性体系下所赋予历史的文化和政治的意义提出了激烈的质疑。³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关系非常暧昧，可以这么说，是现代主义对坚持不断变化的承诺衍生出了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而依照现代性的逻辑本身，它的产生又必须不断地被阻延。换言之，作为现代的辩证否定，后现代每时每刻存在于现代之中。但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时候，后现代脱离现代，提出自己对历史的主张，从而将其置身于现代的对立面？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期论提出了这种见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们一方面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在资本主义中有一种深刻的嬗变，由此而产生出詹姆逊所提出的新的“文化逻辑”。⁴就历史而言，这种思想上的分离最醒目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目的论的抛弃上；于是，后现代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辩证表达，而是走向了其辩证主

3 这不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尽管在与后结构主义相联系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此词的历史发展过程，参见伯顿斯和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Bertens, and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8）。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与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89）。Manuel Castells（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参见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网络社会的兴起》（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6）。我本人更倾向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因为它指向了全球变化的图景。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留心全球资本主义》（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张的对立面,这种思想要求贯穿于整个过去,以达到抛弃所有的“元叙述”的目的。⁵后现代因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点,依照这种视点,“重读”现代性不只是要暴露其“阴暗面”——实际上这种“阴暗面”从来就没有深没于表层底下,更重要的是要指出现代性应为把现代性的文化建立在理性、科学和历史这种主张的错误行为负责。⁶过去二十年间“文化的转变”可归之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产生,它不仅是把文化当作一种物质结构的功能,而是视为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自发的力量。这种意识在资本运作的“文化转变”中得到了加强,因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文化发挥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原则之所以会成为问题,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否定逻辑(或逻格斯)的“文化逻辑”,它不指向超越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尽管在摒弃结构和元叙述——因为它们限制人的活动并且消除了现代性以外的选择——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了思想解放的精神,但是它所许诺的解放既没有空间上的也没有时间上的深度。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像这个词的前缀——“后”(post)——所暗示的那样,总是含糊不清,它用它所摒弃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但却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对于任何逻辑的可能性的否定正是后现代与现代分道扬镳的要点所在。虽然在后现代性中现代性的东西随处可见,但它们只是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出现,失去了现代性曾赋予它们的结构或历史的连贯。后现代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命名方式,对现代性中没有结果的思想解放带来的各种解体现象的命名,它似乎是能无限地包容各种不同思想,包括容忍压迫,但同时又问题百出。伯顿斯如此描述后现代主义,即它要努力“为各种批判——政治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dystopias)——提供一席之地,从对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展望(包括启蒙运动

⁵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 from the French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⁶ 弗朗西斯·巴克、彼得·休姆和玛格丽特·艾弗森:《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重读》(Francis Barker, Peter Hulme and Margaret Iverson,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reading of Modernity*.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和反启蒙运动两种类型)到同样是真诚的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不一而足。”⁷

恩斯特·卡西尔在论述“启蒙运动的哲学”时指出,它宣布了“一种既是自然也是知识的内在性的纯粹原则”,而自然和知识也由此通过它被理性的理解力所获得。⁸ 内在性的原则也同样渗透在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思想中,在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关于它的最坚定的表达。历史学科,尤其是专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历史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寻觅到“文化逻辑”和公共遗产,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怀有这么一种断定,即理性通过对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过去——的事实的梳理能够获得其内在活动过程的真理,由此,各种不同的东西包括文化方面的被归于一种历史中,这种历史声称指向人类共同的理解。

但是,这种声称拥有共同理解、作为一种了解过去的方法的历史需要和那种对于过去的直线性叙事区别开来,那是启蒙运动的关于进步的思想概念所要求的。按照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欧洲将达到人类发展的顶峰。内在性的原则对于那些声称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人来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也使得人们注意到了自然和社会中差异原则的存在。就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历史就是坚持差异,是反对启蒙运动主张的普遍主义这个过程的产物。

后启蒙主义的历史特征表现为对于两个互为矛盾的目标的追求。而它们都可以溯源于启蒙运动思想本身的矛盾,它一方面努力去确认差异,另一方面又试图从差异中构造同一。启蒙运动的普遍性逻辑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它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但也就是这个逻辑产生了不同的历史,而它们是不能被分级的,因为不同的环境造成了这些历史,依照启蒙运动“内在性主义”(immanentism)的原则,它们应拥有它们自己的理性原则,一种历史的理性原则。在内在性思想笼罩下的启蒙运动,一旦差异被发觉并被放

⁷ 伯顿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第 12—13 页。

⁸ 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igrov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1, p. 45)。